

浅论卓尔女性形象在《作女》中的“蜕变”

Mohammed Anwar Elshikh (谢赫)

明亚大学语言学院中文系

E-mail: mohamed.elshaikh@mu.edu.eg

Received: January 13, 2023

Accepted: April 09, 2023

Published: April 16, 2023

Abstract in English

Zuo nu (*Woman on the edge*) portrays the life of a group of restless and self-centred zuonu (women) living in Beijing from the 1990s to the early 21st century, represented by the female protagonist Zhuo Er. The work reflects the awakening of self-consciousness among urban women in Chinese society, as well as their subversion and resistance against the patriarchal society's rules and regulations, and their self-affirmation and self-salvation under new historical conditions. The zuonu have independent thinking, dare to pursue their dreams, and are both a reflection and challenge of this era, as well as one of the symbols of Chinese women's liberation. This study combines textual content analysis to discuss the protagonist Zhuo Er's yearning for freedom and pursuit of a new perspective on love and argues that Zhang Kangkang's *Zuo nu* not only displays the colourful lives of the new era's women and their pursuit of self-value and meaning, but also depicts another landscape of the female world, and shows deep concern for the human condition and spiritual predicament.

Keywords: Zhang Kangkang; *Zuo nu* (*Woman on the edge*); the transformation of female consciousness

摘要

长篇小说《作女》刻画了以女主人公卓尔为代表的 20 世纪 90 年代至 21 世纪初生活在北京的一群不安分守己、以自我为中心的“作女”的生活状态，体现了中国社会中都市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和对男权社会戒律、规则的颠覆与反抗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自我肯定和自我拯救。“作女”们具有独立意识，敢于追求与梦想，既是对这个时代的思考和挑战，也是中国女性解放的标志之一。本文结合文本内容分析了女主人公“卓尔”对自由的向往以及对新的爱情观的追求，论述了张抗抗的《作女》不仅展现了新时代女性多姿多彩的“作”的生活和女性对自我价值和生存意义的追寻，勾画了女性世界的另一片风景，而且表现出对人类生存状态和精神困境的深切关注。

关键词：张抗抗；《作女》；女性意识的蜕变

一、张抗抗与“作女”论

作为中国当代著名女作家，张抗抗创作了许多优秀的文学作品，如《隐形伴侣》《残忍》《白罂粟》《北极光》《情爱画廊》《赤彤丹朱》等。其作品不仅在国内拥有大量读者，还被翻译为多国文字，享誉国内外。爱情、婚姻、家庭是张抗抗作品中的常见主题，她在其中寄寓了自己的爱情理想和婚姻观念，以文字书写的方式表现着深刻的生命体验和丰富的人生意蕴。张抗抗是一位最纯粹的女性写作者，她的小说以反映社会现实的丰富性和深刻性，及所包蕴的丰富深邃的思想内涵和精湛高超的艺术表现手法，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对于许多文学作品中的女性形象问题，张抗抗都有着颇为独到的见解。

2002 年张抗抗发表的长篇小说《作女》，是一部具有当代意识和女性意识的小说。在文本中，白领女性的生存现状和理想蓝图得到了真实且生动的展现。她们选择跃出常轨，拒绝依靠男性，追求一种张扬、独立、自由的生活姿态。小说中的女主人公名叫卓尔，她是张抗抗笔下所塑造的“作女”典型，个性张扬，追求独立，挑战传统，蔑视金钱。她的身上蕴藏着一种不断跃出常轨的冲动与欲望，即对社会规则的挑衅和对自我生命意识的肯定。“卓尔”这一“作女”形象象征着精神的绝对自由，其行为意味着对社会伦理和道德法律束缚的不断挣扎与摒弃。张抗抗试图通过塑

造这样一批独立不羁、卓尔不群的“作”女形象来挣脱现存道德标准的束缚，构建一个美丽的自由的“她世界”。

在小说中，张抗抗使用了一个新的名词“作女”。所谓“作”要读平声，北京、东北、上海、浙江一带的方言中都是有这个“作”字的，原意指那些不安分守己、特立独行、自不量力、任性而天生热爱折腾的女人，可以肯定不是褒义词。（张抗，2002a, pp. 72）。但在张抗抗看来，“作”是男性按照自己的价值标准加给女性的一个贬义词，她要通过《作女》为“作”正名。《作女》赋予了“作”字新的含义，破除了男性话语加诸其上的贬义色彩，体现了新时代的女性不安于现状，勇于拼搏、追求并实现人生自我价值的精神风貌。“作”用以形容女性不满足于现状，通过主动出击与挑战为自己争取更为广阔、自由的空间。这是女性解放的表现：女性不再是被动地接受命运的安排，而是希望由自己来选择或者面对自己的生存状况，一旦达到目标，她们或将停止“作”的步伐，按照自己追求的生活方式生活；或将继续“作”下去，在她们看来，“作”意味着不断地破而后立，在放弃中获得新生。作为一位具有较强女性意识的作家，张抗抗不仅对自身的精神独立性有所要求，而且多次在文本中呼吁女性自主、自立、自强。在《作女》一文中，张抗抗从独特的女性视角出发，关注生活中的“作女”，描写她们的个人欲望和生活姿态，用真实的生活书写破除对“作”的刻板印象，为这群“作”出了自我却为意识规范所不容的新女性正名。她们的一些行为可能不被传统所接纳，但是她们身上那种人类共通的创造力、生命力却光彩十足，她们所追求的经济上、人格上、情感上的独立正是现代社会全世界人追求的生活状态。“作女”总是精神饱满地去迎接生活的挑战，并且乐于不断尝试肉体和精神的冒险，渴望在男权社会中争取独立的自我，渴望自由和理想的生活。

张抗抗为什么写“作女”？因为“作”成为张抗抗小时候一个明显的性格特征，如她自己所说：“我想我少女的时候，少女时代，那时候曾经是青春叛逆期，肯定有一个特别强烈的‘作欲’发作的时期，我觉得在那个时候可能是比较‘作’，包括我到黑龙江去……”。（张抗抗，2001）。连张抗抗本人都解释不清楚去黑龙江的具体原因，她就放弃了靠近外婆家很近的知青点，因为她当时已无法安于一隅，她的内心的骚动无法停止。她心中深埋着文学的种子，中国人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行走是许多作家开始自己文学生涯的契机，所以张抗抗选择了行走。她写到：“写作迫使我走向内心去寻求自由，写作能够促使我对人、人生和社会发问，

通过发问来整理和慰藉自己，并为自己创造想象的空间”。（张抗抗，2002d, PP158）她还认为我们生活中已经有很多“作女”：“近二十来我发现自己周围，有许多女性朋友，越来越不安于以往那种传统的生活方式，她们的行为常常不合情理，她们不认命、不知足、不甘心，对于生活不再是被迫无奈的承受，而是主动的出击和挑衅，她们更注重个人的价值实现和精神享受，为此不惜一次次碰壁、一次次受伤……我把这样的女人誉为‘作女’。”（张抗抗，2002b）。她们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所表现出来的狂热以及盲目的“作”态，其实是女性的自我肯定，自我宣泄、自我拯救的别样方式；是现代女性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自己能力的检测和发问。从90年代到今天，都市女性中“作女”越来越多的现象，也许可视为中国女性解放的标志之一。（张抗抗，2002c）。

“作”在当代中国文化环境中的含义是非常具有弹性的，“作女”都是充满创造力的人，她们之所以“作”，是因为她们现在的发展空间还太小，当她们的要求与社会观念发生冲突时，内心就会有一种跃动，是对社会规则的挑衅和对自我生命意识的肯定。“作女”的出现，并不仅因为外来的西方女权文化的影响，更是因为中国本土文化某种继承性、共同性，同时又有着各自凸出的特征，其中最为明显的则是对待婚姻、家庭的态度，她们不满既定的婚姻、家庭的内容与模式，于中感受到了制约。对于那些“作女”而言，婚姻、家庭有时候是一种重新追求，而有时候则是一个包袱，她们会根据自身的需要做出选择，这都为今天“作女”的诞生和生长奠定了深厚的基础。小说展示主人公及其女友的部分生活，塑造了一批独特甚至有些另类的女性形象。以35岁成熟女性卓尔为代表的“作女”们，个性异常突出，是一群对什么都感兴趣但又喜新厌旧的女性。

二、卓尔对自由的渴望与追求

张抗抗评述自己历年的创作时说道：“尽管在叙述方法上有许多变化，但有一些实质性的东西是始终延续，并被我自己所坚持的，这就是对人的精神世界的关注”。（张抗抗，2002e）。《作女》体现了对自由的不懈追求。卓尔为了去南极放弃待遇丰厚的美编工作。她放弃工作不是因为工作的艰难。放弃工作之后也没有表现出下岗的苦难。相反，她总在辞职，她总会以各种原因辞职。比如卓尔想去南极，放弃工作的理由是：“你以为我每天写写画画就活得轻松自在了？那活儿我早就干够了，给人配图画版，一点创造性都没有。上班下班，看人眼色，重复、每天的日子没完没了的重复，就像一颗被送入轨道的人造卫星，绕着地球一圈圈转，一直转

到报废……我够了，再这样下去，我迟早会死掉的！”（张抗抗，2002a, pp18）上班的路上，她从不走相同的固定路线，她喜欢依照每天的心情，来选择一条不一定最近，也许比较令人愉快的途径，她也喜欢用小巧灵活的车型，这种车型掉头灵活。她将“追求自由”贯彻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发型随心所欲、千变万化，吃饭千奇百怪、创意无穷。卓尔还特别喜欢搬家。对于生活，卓尔选择跟随自己内心的意愿，其一切行为都以“自由”为旨归。在张抗抗看来，“作”本身是一种创造力。张抗抗说过：“没有选择便没有自由，更没有创造”。（张抗抗，1998），和一般的女人不同，格格不入，她的选择就像“另类”人的选择。

卓尔的“作”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这是她追求自由的特殊方式。在对待男性的态度上，卓尔从不将男性作为自己幸福生活的依仗，拒绝社会世俗对女性“贤妻良母”的身份预设，或将男性作为解决单身生活的伴侣，或将之作为事业上的合作伙伴，又或将之视为惺惺相惜的朋友知己。前夫刘博或许在世俗大众眼中是一位优秀的婚配对象，然而卓尔却只看重两人的灵魂是否能够共鸣，并因性情的无法兼容而毅然决定放弃这段婚姻。观鸟人本是生活中萍水相逢的陌生人，卓尔却因两人精神上互相吸引而真情相待。对于事业有成的郑达磊，卓尔也并未逢迎献媚，而是始终保持自身的完整性与独立性。

卓尔的生活以世俗眼光视之，似乎过于离经叛道，她没有稳定的工作，甚至过着居无定所的漂泊生活，“作”是她生活的唯一原则，而自由、张扬、随意则是她为自己选择、创造的生活姿态。卓尔进入天琛公司工作，并非丰厚的薪酬吸引了她，而是“想象——否定——再想象——再否定”的工作过程使她产生了极大的兴趣。“我是我自己”——这是卓尔在广告策划中大声提出的一句口号，通过这一宣言，卓尔再次完成了对自我独立性、完整性和自我价值的确认。而作家在此处更是借卓尔之口再次呼吁女性的自主、自立、自强。

都市中的卓尔却并未被消费文化所裹挟，她将都市作为能够更好地实现自我的舞台。纷扰的物质迷云并未扰乱她的生活逻辑，卓尔的价值观、生活态度和行为方式都始终保持着自身独树一帜甚至有些标新立异的独特气质。与费尽心机维持“窈窕淑女”形象并成为郑太太的陶桃相比，卓尔拥有着更为恣意、自由的生命姿态，而前者却在消费文化的泥泞中日渐沉沦，画地为牢。

三、卓尔寻求新的婚姻爱情观

对于婚姻、爱情，卓尔主动出击，极有主见。在卓尔身上，传统女性羞涩等待的被动姿态彻底消失，她频繁离婚约会，既不依靠男性，也绝不当第三者，尊重并听从自己内心的欲望。昔日的传统婚姻主要根据“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或者是某种利益交换的产物，讲究“门当户对”，在这种婚姻上，女性几乎没有发言权。《作女》中的卓尔是一个无处不作、无时不作与无事不敢作的女性。为了“作”得有声有色，她首先把一个家庭“作”没了，她稀里糊涂地，一开始就没有领会“家”的内涵，连她自己都不明白为什么和刘博结婚，每天只吃醋溜白菜，东西必须放在固定的位置，对于这样一个墨守成规的刘博，卓尔毅然放弃了拥有美国绿卡的机会与大男子主义化身的丈夫刘博离婚。关于婚姻，“作女”们有着自己的独特见解。

“就说“作女”吧，会给自己带来很多麻烦，也给别人带来一大堆麻烦。那么通常我们正常的家庭秩序是很难容忍这样的生活方式的，所以，她们为了使自己能够坚守自己的这样一种信念和尊重自己的愿望，那么她们只能选择独身。这其实是一种无奈。这种无奈来自于实际上男性还不能够完全地接受女性的这种极强烈的独立精神，所以她得有一个过程。还有一个就是在整个社会进步过程中，婚姻它也逐渐变得不像以前那样只是独一无二的一种情感方式，或者说生活方式。”（张抗抗, 2001）。

或许“作女”离经叛道的婚恋行为会被视为对传统伦理道德的颠覆，然而传统并不意味着天然合理。“作女”的出现应当引起人们对传统伦理道德的一次反观，其对女性自然欲望的压抑与损害已然太久，对于女性而言是一种极为严苛、扭曲的束缚。

笔者一直认为“作女”这个名称是贬义词，在日常生活中，倘若某某人在异性面前表现的过于矫情扭捏，或者有事没事表现得异于普通人，或与平时行为大相径庭，那这个词就派上用场了；然而，本文中作者张抗抗却赋予了这个词新的含义，尤指那些不安分、追求自由而又天生爱折腾的女子。很显然，这个词这时褒贬难分。

卓尔一向我行我素，与刘博离婚，和火锅店的老板老乔保持着婚外关系，不顾道德谴责，甚至因为某些原因与自己的老板，闺蜜陶桃的男友发生了关系，她的爱情婚姻观念可以说是无拘无束，甚至有违伦理，这是我不喜欢的一点。

四、卓尔女性意识的蜕变

解读 20 世纪中国女性文学，可以发现女性作品经历了一个蜕变期。早期女性追随崇拜男性，放弃自己思想上的自主权，将之托付给男性偶像。儒文化中“女子难养也”的旧观念，数千年封建文化对女性个体存在意义的打压，导致了长期以来女性形象都是男性的崇拜者与服从者。在爱情婚姻中，女人经常受到男朋友或者丈夫的伤害与欺骗，哪怕碰上了心里爱的男人，也不能选择，因为有父权安排。父系文化占据统治地位，女人们处在文化的边缘地带。美国著名的女性主义者阿德里安娜·里奇曾经指出：

“父权就是父亲的权力，父权制指一种家庭社会的、意识形态的和政治体系，在此体系中，男人通过强力和直接的压迫，或通过仪式、传统、法律、语言、习俗、礼仪、教育和劳动来决定妇女应起什么作用，同时把女性处处置于男性的统辖之下……”。（康正果，1993, P3）。在中国传统父权话语的规训下，“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要求儿女服从于父亲，妻子服从于老公，在几千年强大传统文化的制约下，女性除了难以克服的生理机体上的力量弱于男性的缺陷之外，其内在个性也难以得到张扬，个人欲望更无从得以满足。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国文学史上的第一个女作家群终于向社会发出了呐喊，要求打破性别歧视，争取人格独立，提倡女性在精神上的完全独立。文学作品中出现了经济独立、思想开放、生命力旺盛、不断冒险尝试、自强、自我解放、大胆的现代女性。她们反抗一直以来受限制的处境，想要摆脱男权社会加之于妇女长期生理、心里、情感上的一切束缚，不需要再男性身上找存在感。她们想从自己的真实感受出发去实践自己的想法，还想逃避男性世界，激烈地反叛几千年的中国封建社会和男权主义对女性的身心压抑，表现出对传统价值观念的彻底蔑视，寻找一条向未来的路，创造自己的未来，希望每天能活得有滋有味。弗吉尼亚·伍尔夫强调女性们需要“一间自己的屋子”，这样才能够独立自主地思考。而在张抗抗看来，“一间自己的屋子”有更深刻的含义，那间屋子并不是把女性封闭在属于自己的一片小天地中，相反，屋子的门通向更加广阔的远方。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人心，女性们也开始了她们的个性解放。在西方女权思想的影响下，中国女性对自身的关注更为自觉，她们开始有意识地寻求自我价值。正如“五四”新文化运动在女性独立进程上的重要意义，中国当代女性文学也同样也承担着书写女性意识，探索女性解放道路，从女性角度认识、思考、参与世界的任务。毫无疑问，在张抗抗的作品中充分展示了当代作家对女性意识的觉悟与自己的女性意识的蜕变，充分展现了新时期女性对女性灵魂的自审。小说《作女》突破了

传统女性意识，塑造了卓尔富有挑战精神的都市形象，表现了她不安于现状的理想追求、生命活力和精神状态。虽然女主人公卓尔完全可以找个爱人安分守己地过平静日子，但这一切恰恰是卓尔厌倦的，她具有独立的精神气质和叛逆性格，而且非常性感。在她的生活中，没有什么是男人能做而她不能做的事。她的内心涌动着对已有的生活状态的厌倦以及对新鲜生命的渴望。比如阿不这个人物，无论跟谁说一件事，她吐出来的第一个字是“不”。卓尔对女性的传统价值观念表现出叛逆，她活得有生有色、有滋有味。卓尔进入婚姻生活之后，不久发现实现不了她对于情感的渴望，就逃避婚姻了，因为婚姻生活各方面带来了不适应和失望。她怎么努力都找不到她要寻找的爱情。而卓尔逃避婚姻不只是因为找不到理想爱情。卓尔的丈夫刘博是她大学时候的同学，在加拿大读博士，她丈夫安于现状，喜欢每天的日子一成不变，按照固定不变的程式进行。而卓尔则喜欢追求动态的新鲜感，二十多年来，刘博一直吃着白菜和红烧肉成长，百吃不厌。卓尔的原则是饭菜好坏无所谓，但不能重复，因为她讨厌每天吃同样的东西。她还拒绝性爱总是由男性把握性关系，她反抗男性的性霸权，要求所有的女性成为自己性爱的主角，从被动变为主动。卓尔一次去北海寻找投资项目，一位朋友介绍她到邻省的一个小城。她知道离那个城市一百多公里之外有一个著名的风景地，坐上旅游巴士独自一人到了那个被称为小镇的村子，第二天她开始背上新购置的睡袋玩了一整天，天黑了回到帐篷那儿，卓尔入睡了不久感到好像正在发生什么。那位观鸟青年男子猛烈地抱住了她，对卓尔说：“我要你！”她脑子立刻蹦出一个想法：“这句话被男人说了千年，从来都属于男人专用的话语，为什么只能是他们要，而不能是我要呢”。卓尔还拒绝刘博。她拒绝的原因更多是由于厌倦。婚后不久，卓尔就发现，刘博每次做爱的程序都是一模一样的。在与男人的关系中，卓尔不仅是主动的，她还处处要占上风，从不肯委曲求全。例如在花钱这件事上，卓尔讨厌花男人的钱，更讨厌花与自己关系接近的男人的钱。有一次和几个女性朋友去一个酒店喝酒，卓尔看到了一张画面，画面上画着一个女人，亲热地挽着一个男人，一只手伸在他的衣兜里，画面上有一行大字：教你如何花光男人的钱。卓尔为此燃起勃然怒火，她马上意识到这是对全体女性的侮辱，当场要求经理取下这画。后面因为经理不同意把画面取下，卓尔和几个伙伴们打架，抄起酒瓶大打出手，她完全是按照自己的意愿，将社会伦理道德束之高阁。

通常人们认为“作女”这个名称是贬义词，在平常生活中，倘若某某人在异性面前表现的过于矫情，那这个词就派上用场了。然而，本文中作者张

抗抗却赋予了这个词新的含义，尤指那些不安分、追求自由而又天生爱折腾的女子。很显然，这个词褒贬难分。

女性意识是女性对自身价值的思考，它既是性别意识的觉醒又具有着社会属性。在女性意识觉醒初期，争取经济与社会地位是女性的主要诉求。而随着时代发展，女性意识的内容也不断得以补充和丰富，女性逐渐认识到现实生活中男性的压制并非造成女性困境的唯一因素，因而转向挖掘女性地位之所以形成、改变的社会、历史因素。这正是张抗抗的《作女》要挖掘的女性意识的精神境界，正是从女性视角挖掘潜在的女性意识的哲学理念。

五、结语

张抗抗推出的《作女》赫然写着：“本书献给她世纪”，这本小说以“作女”命名和正名，为女性意识极度张扬的“她世纪”留下了一部“作女”档案，以文字形式书写了一场女性的“精神革命”和思想解放。小说中，作者不光重新梳理了女性的生理、心理和情感特质，还重新探讨了女人的优点和弱点，它创造出的一个新词——“作女”，已然成为新世纪之初一个时髦的词语，其创作是“与时俱进”的。众所瞩目的女性意识，其实经历了一个明显的蜕变过程，从早期对男性偶像的追随、仰视到女性自主、自立、自强。作者呼吁女性意识的觉醒，做新时代女性，追求自由和内心的梦想。

《作女》整个小说中，那些女性角色都能给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象。作品受到社会时代和思想背景影响，笔下的人物形象的命运和性格都是具有社会基础和思想基础的。无论是肆无忌惮，放肆“作”的卓尔，还是随波逐流，安分守己的陶桃，还是一堆说不上名的A小姐，B小姐，都具有北京城各个群体的代表性。对于张抗抗《作女》女性地位的异化的研究不仅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也具有积极的现代意义。

笔者通读了小说后，感触颇深，从作者幽默诙谐又不失精彩的文笔中了解了这个时代不同女性的心理特征、思想观念、爱情观、生活情况，似乎身在北京众多“作女”中，感受着她们对生活循规蹈矩的厌烦。有人选择妥协、无奈，而有人却极力反抗，并从其中寻找乐趣。其实，这些所谓的“作女”只是某个群体在这个年代中的代表，她们放大了我们每个不喜欢安分守己，苟延残喘，屈服于百无聊赖的生活的每个人。

我想，作者想表达的无非是对平庸而缺乏个性、媚俗而哗众取宠的群体的嗤之以鼻，对那些不甘平庸，乐于享受生活，不在乎旁人眼光，为自己而活的“作女”们的支持，像主人公卓尔，毕竟卓尔不群，类似那句简单却不失真诚的名言“我是我自己”，随意“作”。

参考文献

- 康正果. (1993). 女权主义与文学.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张抗抗. (1998). 大荒冰河. 吉林: 吉林人民出版社.
- 张抗抗. (2001). 女人说话(三)——我作故我在. 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栏目组.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张抗抗. (2002a). 作女. 北京: 华艺出版社.
- 张抗抗. (2002b). 眼中笔下的作女. 光明日报.
- 张抗抗. (2002c). 我为什么写《作女》. 文艺报(文学周刊), 第二版.
- 张抗抗. (2002d). 你是先锋吗?. 上海: 文汇出版社.
- 张抗抗. (2002e). 我们为什么而作. 北京: 北京青年报.